

中国学者如何进行国际创业研究

——读《动荡时代下的国际创业》的体会

□ 蒙 双 李卅立

摘要：Zahra 教授对近三十年的国际创业研究进行梳理，并对中国国际创业的研究提出展望。本文围绕 Zahra 教授的观点进行分析，认为研究中国企业的国际创业应该做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构建跨学科的理论框架来研究，二是结合经济新常态来发现新规律。本文还分析了当前中国的国际创业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的国际创业研究可行的方向，对中国管理学者如何做好中国自己的国际创业研究提出有益建议。

关键词：国际创业研究；跨学科研究；情境研究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加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全国日均新登记企业户数从 2013 年的 0.69 万户上升至 2018 年的 1.81 万户，市场活力不断提升。据《全球创业观察 2017/2018 中国报告》统计，2009 年仅 1.4% 的中国创业者拥有海外客户，而到了 2018 年这一比例超过了 30%，中国在国际创业方面发展迅猛。作为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蓬勃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球化全面深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然而，全球市场正在面临着巨大的变化，企业正面临着科学技术加速升级、数字经济崛起以及反全球化势头兴起等重大变革。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国际创业指的是为创造未来商品和服务而跨越国界去发现、创造、评价与开发机会的过程（Oviatt & McDougall, 2005）。国际创业是管理实践中的一种新兴现象，在学术研究中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已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关注^①。与蓬勃发展的国际

^① 代表性研究综述包括：Cavusgil 和 Knight (2015), Jones 等 (2011), Zahra (2005), Zander 等 (2015) 等。



创业实践不同的是，中国的国际创业学术研究仍在起步阶段。当前，中国的国际创业已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国际创业研究理应成为国际创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接下来将结合 Zahra 教授的观点，谈谈对中国管理学者应该如何进行国际创业研究的认识。

一、构建跨学科的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企业的国际创业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的贸易投资壁垒和不断提升的运输和信息传输技术，大幅降低了企业国际化的成本，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国际化给创新和创业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进而产生了很多天生全球化的企業（born global firm）（Cavusgil & Knight, 2015）。规模不大、资源有限的初创企业也能快速地进行国际化。学者们发现这一现象已不能单一地用国际商务理论或创业理论来解释。例如，初创企业向国际市场的快速扩张已经不能被传统的国际化经营阶段理论解释；而创业理论关注的重点在于新企业的创建过程和国内市场经营。因此，有必要融合两个学科的理论来研究国际创业问题（McDougall & Oviatt, 2000）。

正如 Zahra 在文中提到的，国际创业的研究是国际商务研究与创业研究的一个重要交叉。创业活动是国际创业的一个前提，国际化是创业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因此国际商务理论和创业理论为国际创业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Zahra 教授在早期主要关注创业领域的研究。例如，Zahra 和 Wright (2011) 提出了创业

研究多维度的基本构架，其中包括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s）、创业活动（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和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三者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创业研究的框架。结合 Zahra 教授此前的研究以及《动荡时代下的国际创业》一文，本文将创业理论与国际商务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制度理论和知识学习理论等其他领域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并结合中国的现实问题，讨论中国的国际创业研究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国际创业的微观基础

创业过程的微观基础包括：企业高管或员工的认知行为，企业学习新知识、转换知识、能力积累和团队协作等微观过程（Zahra & Wright, 2011）。此前的国际商务研究的重点是企业层面，尤其关注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国际商务战略等方面，而忽略了企业中的人和事件发生的过程这些微观因素。因此，将创业研究和国际商务研究相结合来研究国际创业，尤其是国际创业的微观基础就具有较重要的研究意义（Coviello et al., 2017）。

Zahra 教授文中提到，企业参与国际创业的最主要的动机就是吸收新的知识，用来为企业的进一步扩张做储备（De Clercq et al., 2012）。此外，国际创业还可以提升企业的吸收能力，即企业获得、运用、吸收新知识并将其用于商业化的能力（Zahra & George, 2002）。天生全球化的企业在获得新知识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天生全球化企业通常拥有比较简单的组织结构，它们可以快速获得并吸收新知识并加以应用，这些知识可以转化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上。获得并转化新知识的这种优势

对于很多其他类型企业来说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然而，当前对于企业从国际化扩张中获取新知识的微观基础的研究仍然欠缺（Park & Harris, 2014）。因此，研究企业如何通过国际创业来成功吸收和应用新知识就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因此，对于参与国际创业的企业学习过程，学者们仍需探索这些问题：学习活动是什么时间（when）、在哪里（where）、如何（how）发生的？企业是如何在国际创业中进行学习的？企业在不同市场环境中是如何进行学习的？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模式能更好地促进这种学习效应的实现？什么样的高管团队或者运营团队能更好地促进初创企业的学习效应？这些问题也是了解国际创业的学习过程的微观基础，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国际创业企业的行为模式的理解，同时也能给管理实践者如何进行创业和创新带来启发。

当前国际创业的微观基础的研究发展较为缓慢的原因在于外界很难观测到企业内部（尤其是初创期的企业）的创业行为，这使创业活动中的微观行为很难定义和测量。因此，这就要求学者有更好的条件和资源来记录初创企业的国际化行为，才能进行高质量的研究。

在中国，研究数据和管理现实的冲突这一点尤为突出。Zahra 教授提到，虽然中国的创新创业活动发展十分迅速，但是由于资源的束缚，中国企业可能会实行“节俭创新”。如果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而不进行深入挖掘企业的创新和国际化流程，则可能得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路径也是节俭的”这样的结论，但这一结论并不一定能反映中国真实的管理实践规律。因

此，这就需要研究者们在研究设计上更为细致和谨慎。只有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研究设计和归纳总结，才能得出更加严谨的研究结论。

（二）国际创业的创业活动

创业研究中通常将创业活动分为三类：公司创业、技术创业和战略创业。Zahra 教授指出，将这三类活动与国际商务、战略管理、企业治理等理论相结合，可以更深入地分析中国的国际创业行为。

企业创业指的是企业通过投资或其他创业行为来获得战略革新的过程。在中国，不同所有制结构企业的国际创业值得关注。一类是占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其凭借政府关系获得的资源优势应如何在国际创业中进行有效转换值得研究。另一类是为私营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的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所有权和治理结构具有特殊性，其独有的社会情感财富使它们在国际化中承担风险的偏好与其他企业有所不同（Li et al., 2015），而家族企业的国际创业研究仍比较欠缺。

技术创业指的是企业将整理和利用与科技进步相关的知识以创造价值的过程（Bailetti, 2012）。Zahra 教授在文中提出，在技术创业的过程中，企业如何进行决策，如何组建运营团队，如何设计组织结构，如何在不同的市场进行商业化等问题都值得研究。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地方制度的规范和完善都直接影响到技术创业的效率和结果。而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常面临知识产权合规性的考验。同时，各国的创新政策各不相同且复杂多变，关于初创企业应当如何应对这些政策因素来进行技术创业的研究仍然比较缺乏。因此，技术



创业也是研究当前中国企业的国际创业的一个可行方向。

战略创业指的是企业将寻找机会和优势的创业活动作为战略更新的手段，以获得超额企业绩效的行为（Ireland et al., 2003）。Zahra 教授指出，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关注点就是企业如何将创造新机会的创业行为与创造比较优势的战略性行为结合起来（Agrawal et al., 2007）。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战略与创业活动是相互影响的，互为因果的。对于这类行为，就需要将战略管理理论、资源基础观理论、动态能力理论融合到创业理论中进行分析（Teece, 2014）。在这个层面，有许多问题仍然值得探索：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结构、不同组织结构、不同发展阶段的国际创业企业的战略创业有什么特点？企业内外部的哪些因素会激发国际创业的企业进行战略创业？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创业活动的类型种类繁多，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不同的创业活动的分类也是不同的。在研究国际创业时，通常还需要考虑这些创业活动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异同，这对于研究者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

（三）国际创业的情境化

Zahra (2007) 指出，国际创业研究要立足于管理实践和创业现象，充分结合情境的影响因素来进行。Zahra 教授在文中提到，创业研究的情境因素中最重要的三个维度是文化、制度和时间。

首先，创业、国际商务和竞争力都是与文化息息相关的主题，因此文化对于研究国际创业十分重要。在初创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学者们可以关注的问题包括：企业在不同文化的

市场中是如何进行学习的？初创企业在文化距离远的市场是如何进行创业活动的？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初创企业的学习传递机制是怎样的？为解答这些问题，学者们可以将创业理论、国际商务理论和知识学习理论相结合进行研究。

其次，国际商务研究强调制度对于企业的战略行为的重要影响。一个完整的制度框架是由支配个人和企业行为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构成（Meyer & Peng, 2005）。对于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来说，它面临的是多方面的制度，包括母国的制度、目的国的制度和国际的制度。母国和目的国的制度可以通过资源供给、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市场化程度等影响国际创业的类型、深度和广度。此外，国际的制度也通过影响国家之间知识、资本和人才的流动，进而影响一国企业的创业行为。初创企业如何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平衡市场、制度和政府的关系仍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需要将创业理论、国际商务理论和制度理论相结合进行分析。

最后，时间这一因素在国际创业研究中也很重要。时间的因素包括创建企业和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选择。Zahra 教授指出，时间这一因素可以作为历史的推动力、战略目标或者组织行为的结果来研究。同时，时间维度是理解企业创业活动和创业环境动态变化的关键因素，也是创业研究与政策研究联系起来的纽带（Zahra & Wright, 201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化成本的下降和全面开放的基本国策的展开，中国企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和较快速的国际扩张。Zahra 教授指出，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发

展中国家，时间是研究中国企业的国际创业和别国企业异同的关键。中国的企业是在什么阶段选择走出去的？又是在什么时间选择扩张的？企业在不同发展时期或者在不同的动态环境中是如何进行国际化的？不同国家之间同期的创业行为是否能够直接比较？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将有助于我们构建基于中国情境的新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创业的情境化研究也要求学者更多关注中国的一些特殊情境。首先，中国特有的文化和制度因素造就了中国企业不同的国际化路径和行为决策模式。国内的政治环境、市场化改革、制度缺陷等会给初创企业的国际化带来不确定因素。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这些问题：国内不同市场化程度对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国际创业行为的影响；初创企业的国际化是制度驱动还是制度逃离等（Luo & Tung, 2007；Wang et al., 2012）。

其次，在过去 20 年中，中国向海外输送了大批的留学人才，而这些人才在近年来有归国就业和创业的趋势，海归人才在海外经验、文化认知和管理模式上可能有别于本土人才，因此海归人才在初创公司的就业或者直接创业对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创业的影响极为重要。

最后，随着中国的国家地位的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逐渐增加。但由于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至今仍然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的质疑。那么，中国的崛起与国际地位的提升对于企业的国际创业有何影响？中国的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是否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这些都是可行的研究方向。

二、结合经济新常态来研究

中国企业的国际创业

（一）国际创业与数字经济发展

Zahra 教授在此前的许多研究中强调情境的重要性。那么，外部市场条件的改变也是情境因素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Zahra 教授在文中指出，早期的国际创业研究关注的是传统产业，这些产业通常以技术为基础，且有着比较完善的结构、规则、制度和参与者。然而，随着新兴业态的出现，产业的边界变得模糊。随着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兴起，传统的产业结构和竞争动态都完全颠覆。在平台生态系统中，竞争参与者不是单纯的竞争关系，企业需要相互依存才能获得价值（Adner, 2017）。在数字化平台中企业的国际化活动在企业资源、用户基础和信息扩散等方面与传统企业也有着很大的区别（Brouthers et al., 2016）。

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初创企业的国际化非常需要依赖战略创新来进行价值创造。战略创新指的是企业定义市场机会，感知新市场和设计并实施商业模式的过程。对于一部分企业来说，尤其是天生全球化的企業来说，这些决策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对于其他企业来说，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来找到合适的方法和组织结构去进行战略创新。企业的组织结构设计、信息传递系统的效率等都影响着企业的吸收能力和创造价值的能力。然而，关于平台生态系统中的国际创业问题的研究仍然很欠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有三类现象值得学者的关注：一是移动互联出海已成为中国企业



国际化的重要力量。当前，部分工具类移动应用、游戏、内容输出的移动互联企业已然成为“天生全球化”的企业，代表性的企业包括汉迪(iHandy)、赤子城(Newborn-town)等。此外，成熟的互联网企业进行国际创业的脚步也在加快。例如，猎豹、腾讯、美图秀秀等企业自2011年起陆续推出海外移动应用，并在很多国家占据了同类产品的较大的市场份额。中国的移动互联企业国际化的丰富实践给了学者们很好的研究契机。

二是传统行业的初创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已经迫在眉睫。当前，“互联网+”的不断深化发展、经济新常态对企业效率的要求不断提高，传统制造企业在海外的分销渠道、营销手段、客户沟通等方面都需要进行数字化转型才能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Reuber & Fischer, 2011)。很多传统制造企业已通过引进如SAP等智能办公软件和数字解决方案来完成转型。但是，这给资源较为匮乏的初创企业带来不小的挑战。进行国际创业的企业应该如何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进行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初创企业应当如何应对数字转型过程中的竞争？这些问题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学术过程中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三是跨境电商的发展为国际创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首先，eBay、阿里、亚马逊等大型跨境电商平台给很多初创企业提供了更便捷的进入海外市场的机会；其次，天猫、京东等购物平台加速“走出去”，平台上的创业者可以服务到更多的海外客户；最后，跨境电商平台创业也在崛起，具有代表性的有网易考拉海购、蜜芽、豌豆公主等电商平台。在跨境电商不断

发展的背景下，国际创业企业应当如何选择电商平台？应当采取何种产品策略？应当选择何种商业模式？这些都是值得学者们关注的问题。

(二) 国际创业与反全球化趋势

当前，反全球化的趋势一定程度上阻挡着全球化的进程。民族主义的复苏也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和投资壁垒以不同形式出现。同时，民族主义的情绪也会影响消费市场，消费者对国外的商品或服务可能产生排斥的心理。这就可能导致企业国际化的成本增加和需求下降，资源相对匮乏的初创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也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不仅是中国企业所需要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球各家企业同样面临的挑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初创企业应该如何进行国际化扩张？中国的企业能否通过有效构建新的商业和政治同盟来进行国际创业？这些都将是摆在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议题。

三、结语

Zahra教授结合他十几年来从事创新创业研究的经验，提出了一个关于如何研究中国企业的国际创业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丰富了国际创业的研究视角，对于中国的管理学者提供指导和启发。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变幻莫测，各学科的研究也在飞速发展。国际创业的研究多是现象导向型的，还没有十分完整的理论分析体系，如何借助跨学科的优势以及结合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来进行国际创业研究正是中国管理学界未

来值得探索的研究方向。

中国制度环境的特殊性对学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学者需要从中国企业国际创业的丰富实践出发去寻找新的理论视角来解释这些问题。除了本文提到的国际商务、战略管理、制度理论外，学者们还可以结合社会网络理论、组织行为理论等进行研究。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能够重视国际创业在管理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加入中国企业的国际创业研究中，发现新规律、构建新理论，提升中国管理学研究在国际管理学界的地位。

接受编辑：Haiyang Li

收稿日期：2019年2月1日

接受日期：2019年2月16日

作者简介：蒙双（E-mail：mengshuang@cufe.edu.cn），现任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研究兴趣包括跨国企业战略管理、国际创业和企业治理，研究成果发表在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期刊上。

李卅立，现任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 Moore 商学院副教授，美国犹他大学国际企业管理与战略管理学博士。他的研究兴趣包括跨国战略，重新审视基于资源的观点和国际企业家精神，特别关注新兴经济体和数字公司。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等期刊上。

参考文献

- [1] Adner, R. 2017. Ecosystem as structure: An actionable construct for strategy. *Journal of Management*, 43: 39–58.
- [2] Agrawal, R., Audretsch, D., & Sarkar, M. B. 2007. The process of creative construction: Knowledge spillovers,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1: 263–286.
- [3] Bailetti T. 2012.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Overview, definition, and distinctive aspects. *Technology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view*, 2: 5–12.
- [4] Brøthers, K. D., Geisser, K. D., & Rothlauf, F. 2016.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business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7: 513–534.
- [5] Cavusgil, S. T., & Knight, G. 2015. The born global firm: An entrepreneurial and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on early and rapid interna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6: 3–16.
- [6] Coviello, N., Kano, L., & Liesch, P. W. 2017. Adapting the Uppsala model to a modern world: Macro-context and microfound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8: 1151–1164.
- [7] De Clercq, D., Sapienza, H. J., Yavuz, R. I., & Zhou, L. 2012. Learning and knowledge in early internationalization research: Past accomplishment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7: 143–165.
- [8] Ireland, R. D., Hitt, M. A., & Sirmon, D. G. 2003. A model of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The construct and its dimens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29: 963–989.
- [9] Jones, M. V., Coviello, N., & Tang, Y. K. 2011.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1989 – 2009): A domain ontology and thematic analysi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6: 632–659.
- [10] Li, X. C., Chen, L., Chua, J. H., Kirkman,



- B. L., Rynes-Weller, S., & Gomez-Mejia, L. 2015. Research on Chinese family businesses: Perspective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1: 579–597.
- [11] Luo, Y., & Tung, R. L. 2007.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A springboard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8: 481–498.
- [12] McDougall, P. P., & Oviatt, B. M. 2000.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The intersection of two research path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 902–906.
- [13] Oviatt, B. M., & McDougall, P. P. 2005. Defining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odeling the spee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9: 537–553.
- [14] Meyer, K. E., & Peng, M. W. 2005. Probing theoretically into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ransactions,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6: 600–621.
- [15] Park, J. Y., & Harris, S. 2014. Microfoundations for learning with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3: 490–503.
- [16] Reuber, A. R., & Fischer, E. 2011.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internet – enabled market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6: 660–679.
- [17] Teece, D. J. 2014. A dynamic capabilities-based entrepreneurial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5: 8–37.
- [18] Wang, C., Hong, J., Kafouros, M., & Boateng, A. 2012. What drives outward FDI of Chinese firms? Test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re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1: 425–438.
- [19] Zahra, S. A. 2005.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A decade of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6: 20–28.
- [20] Zahra, S. A. 2007. Contextualizing theory building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2: 443–452.
- [21] Zahra, S., & George, G. 2002.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contribu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Chapter in Hitt, M., Ireland, D., Camp, M. & Sexton, D., eds.,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es for Wealth Creation*. New York: Blackwell, 255–258.
- [22] Zahra, S. A., & Wright, M. 2011. Entrepreneurship's next act.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5: 67–83.